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4.006

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如何解释?

——冒险行为模型的演进、类型与应用

高君杰, 辛素飞

鲁东大学 教育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通常被视为青少年偏好冒险行为的结果。当前主要的青少年冒险行为模型包括双系统理论、模糊痕迹理论、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和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双系统理论强调青少年在感官寻求与自我调节之间的发育失衡;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则揭示了脆弱群体在低效认知控制下的冒险倾向;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进一步强调了社会规范、法律环境和文化差异等风险情境与个人倾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冒险行为的影响;虽然模糊痕迹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冒险行为的变化,但它为理解青少年如何在感知风险过程中逐渐形成社会性认知提供了有效视角。未来应加强这些理论与犯罪学视角的结合,探索青少年犯罪行为背后的多维因素,并为干预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青少年;违法;犯罪;冒险行为模型

中图分类号:B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4-0038-07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参与盗窃、破坏及暴力等犯罪行为在这一阶段频发^[1]。有数据显示,在美国约有 30.2%至 41.4%的青少年因犯罪行为而被逮捕,且在青少年晚期及成年早期情况更为严重^[2]。在我国,青少年的犯罪率相对于欧美国家较低,但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3]。青少年犯罪不仅容易让个体陷入反社会的生活状态,还可能带来一系列改变人生的后果,如学校或刑事司法系统的惩罚。此外,犯罪行为还可能对受害者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支出。因此,深入理解青少年犯罪的性质、成因以及个体差异,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青少年冒险行为模型是用于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前沿理论框架,包含了多个互相关联的子理论。这些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通常既涉及潜在的奖励(如刺激感、同伴认同、物质收益),也伴随着严重的后果(如法律制裁、学校惩罚、受害者报复或同伴的负面反应),而青少年对这些奖励与代价的权衡各不相同^[4]。尽管已有诸多文献论述青少年冒险行为模型下的相关理论,但目前

对于冒险行为模型的发展缺乏系统的学术史梳理,特别是如何运用它们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青少年冒险行为模型的演进为线索,深入阐述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并结合当前研究拓展冒险行为模型在青少年犯罪预防领域的应用。

一、冒险行为模型的演进

青少年犯罪的学术研究可追溯至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欧美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此时“叛逆、激进、破坏”是青少年的代名词,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行为特征^[5]。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家庭结构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剧变,青少年犯罪开始被视为社会变革的产物。

(一)社会结构视角下的早期研究

青少年犯罪的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探讨青少年犯罪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如贫困、家庭破裂和城市化进程。社会学家如埃米尔·涂尔干认为,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变化的反映。根据涂尔干的社会功能主义理论,青少年犯罪并

收稿日期:2025-03-30

基金项目: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No.2024-QNRC-70)

作者简介:高君杰(1999—),女,湖南张家界人,鲁东大学教育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辛素飞(1986—),男,山东潍坊人,心理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学院(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非纯粹的社会病态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进步,一方面通过界定可接受行为的边界强化社会规范,另一方面也可能推动法律和道德的更新,从而具有维持与变革社会的双重功能。此外,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解构理论认为,城市贫困地区的高犯罪率与社会结构的解构以及社会控制的缺失密切相关。在这种环境下,青少年易受不良行为的影响,并在不良同伴的作用下发展出犯罪行为。然而,尽管这些社会结构化的解释在揭示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方面提供了重要视角,但是它们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作用,忽视了个体因素以及青少年的主体性特征。

(二)生物与心理视角的兴起

由此,研究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特别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影响,这使得青少年犯罪逐步被视为个体心理发展失调或生理缺陷的表现。一方面,生物学理论提出,犯罪行为具有遗传性,并与神经生理学基础密切相关。例如,“犯罪性格”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行为可能与遗传、脑部损伤或其他生物因素相关。另一方面,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开始关注个体潜意识中的冲突及童年经历如何深刻影响青少年的行为。此外,行为主义心理学则专注于环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强调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对青少年行为的共同塑造作用^[6]。在这一背景下,青少年犯罪的研究逐渐转向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和群体互动来理解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例如,特拉维斯·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指出,青少年犯罪行为往往源于对社会规范缺乏认同,具体表现为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联系薄弱,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不足。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纽带的断裂或弱化会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偏离常规行为。与此同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青少年通过模仿和学习犯罪行为,尤其是在同龄群体中,来塑造自己的行为模式。罗伯特·默顿提出的常态偏差理论则认为,当青少年面临社会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途径之间的冲突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采取犯罪行为来应对这一冲突。

(三)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整合阶段

随着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和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青少年犯罪的发生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多

个层面交织作用的结果。研究的方向也从单一学科的探讨转向了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强调了多因素综合模型的必要性,尤其是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环境因素的结合。首先,双系统理论由斯坦伯格等人提出,指出情感驱动系统的快速成熟与认知控制系统的滞后发展之间的失衡,是青少年冲动与冒险行为的重要神经机制基础。该理论为理解青少年在风险情境下的行为选择提供了重要框架。在此基础上,模糊痕迹理论由雷纳等人提出,补充了青少年决策过程中的认知特征,认为青少年倾向于依赖概括性、情绪化的信息作出判断,而非详细分析,从而解释了其在信息不完全或冲动状态下的冒险行为,该理论拓展了对情感与认知交互作用下风险决策机制的理解。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则进一步整合上述两者,强调冒险行为在青少年发展中的适应性功能。该模型认为,冒险是青少年积累经验、提升决策能力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在成年后减少不良行为。该模型重视个体差异,认为弱势群体可能因认知控制缺陷与不利环境而形成持续的高风险轨迹。

(四)跨学科综合模型的发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提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框架,强调青少年犯罪行为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该模型不仅继承了双系统理论的生理基础和模糊痕迹理论的决策处理方式,还结合了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对适应性冒险行为的理解,突出了社会环境(如同伴影响和家庭背景)对青少年行为的塑造作用。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的提出标志着青少年犯罪行为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综合的阶段,它为理解青少年如何在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中做出决策,并进而影响他们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全面的视角。总的来说,尽管四种理论侧重点不同,但都试图从不同角度阐明青少年参与犯罪行为时的决策机制。因此,尽管每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但它们都属于冒险行为模型的范畴,并且共同为理解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框架。

二、冒险行为模型的类型

青少年的犯罪行为长期以来被视为个体生理、认知与社会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现有的冒险行为模型恰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复杂过程。其中,双系统理论和模糊痕迹理论分别从

神经生理与认知决策的视角解释个体冒险行为的内在机制;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则整合了上述理论的核心观点,关注个体差异及其发展变化;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进一步强调了个体与社会情境交互作用的重要性。

(一)双系统理论

双系统理论包括几种变体,如双系统模型、成熟失衡模型,以及驱动型双系统模型。其中,双系统模型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因此本文聚焦这一模型。根据双系统模型,青少年大脑中由边缘动机区域主导的社会情感系统发育速度快于由前额叶皮层主导的认知控制系统^[7]。青春期初期,社会情感系统的活跃增强,表现为对奖励的强烈驱动,而认知控制系统则继续缓慢成熟。这种不同步的发育过程导致青少年在情绪激烈的情境下,特别是在同伴在场时,容易做出冲动决策和冒险行为。冒险行为通常指那些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的行为,如受伤、药物过量、被逮捕或性传播疾病等。双系统模型认为,青少年犯罪行为高峰期出现在青春期中期,正是社会情感系统与认知控制系统之间发育失衡的阶段,尤其在情绪激烈的情境下,青少年更容易做出冒险行为。

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充分考虑认知控制和社会情感系统之间的失衡。单纯证明自我调节的效应受到寻求刺激的影响,并不足以直接证明社会情感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之间的失衡是青少年产生冒险行为的根本原因。双系统模型关于青少年犯罪高峰,目前依然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进行评估。在同伴影响方面,青少年更倾向于共同犯罪,该趋势在17岁左右达到峰值,成年后趋向独立作案^[8]。双系统模型将其解释为社会情感系统驱动下的奖赏敏感化过程^[9]。然而,关于青少年共同犯罪高峰的原因,除了双系统理论的解释外,还存在多种替代理论。例如,有研究认为青少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同伴的支持才能进行犯罪;或者青少年所犯的罪行(如盗窃)更需要与他人合作;抑或是青少年本身就更倾向于集体行动,这种共同犯罪只是集体偏好的体现。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切入同一现象,提示同伴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验证,以厘清双系统模型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解释差异。

(二)模糊痕迹理论

模糊痕迹理论是双系统理论的主要替代理论之一,旨在通过决策过程的变化来解释冒险行为

的发展差异^[10]。模糊痕迹理论将决策过程区分为两种方式:逐字追溯决策和本质追溯决策。其中,本质追溯决策更依赖于认知控制,受个体经验的影响,并且倾向于选择较低风险的决策选项,这里的“风险”与双系统模型中的“冒险”定义类似。随着个体的发育,模糊痕迹理论提出,青少年会经历一个转变:他们对逐字追溯决策的依赖逐渐减少,而对本质追溯决策的依赖逐渐增加。这一转变有助于减少冒险行为,因为采用本质追溯推理的个体更容易将任何与负面后果相关的、即使是小概率的决策选项视为不合理的。因此,犯罪作为一种冒险行为,可能会通过本质追溯推理的增加得到有效抑制^[11]。模糊痕迹理论认为儿童的犯罪倾向应是最高的,青少年则表现为中等的犯罪倾向,而成年人表现出最低的犯罪倾向。然而,关于发育过程中逐字追溯与本质追溯推理的变化与犯罪行为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特别是特定类型的犯罪(如身体攻击)在儿童时期达到高峰,而大多数犯罪则在青少年或成年时期达到高峰。这一现象与模糊痕迹理论的预测直接相悖,表明逐字追溯与本质追溯推理并不能完全解释犯罪行为发育差异的原因。这也说明模糊痕迹理论在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时可能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

(三)生命周期智慧模型

生命周期智慧模型结合了双系统模型和模糊痕迹理论的核心观点^[12]。该模型认为,尽管青春早期是冒险行为的高发期,但只有那些在认知控制方面存在先天缺陷的青少年才会出现失衡,进而表现出“适应不良”的冒险行为,如冲动、易成瘾等。而对于大多数青少年来说,冒险行为具有探索性和可控性,是一种“适应性”的行为,有助于积累经验、提升判断力,并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建立自我定位。该模型强调,正是这种通过冒险获得的经验,逐步促使个体从逐字推理转向本质性判断,从而发展出“智慧”,并在成年后减少不必要的冒险倾向,这一过程与模糊痕迹理论中“本质追溯决策”的发展密切相关。

目前已有研究支持该观点,发现部分青少年更容易出现问题性冒险行为^[13]。青少年罪犯之间的个体差异亦催生了诸多分类。其中,双重分类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的年龄高峰由“终生持续型”与“青少年限定型”两类人群构成^[14]。前者通常在童年期即表现出严重行为问题,常与神

经发育缺陷和不良家庭环境相关,其攻击性行为往往持续至成年。后者则多始于青春期,规模较大,其犯罪行为多数与同伴模仿相关,或借助反社会行为表达自主性。最新研究进一步指出,终生型与限定型犯罪者的差异可能是程度性而非类型性的。二者在神经发育风险与认知功能上高度相似,真正的区分在于行为问题出现的时间点:若早于青春期即显现,往往预示更严重、更持久的问题^[15]。例如,一项追踪 11—20 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仅约 7% 的个体(男性约 10%)在寻求刺激与自我调节之间存在显著失衡,伴随高频犯罪行为;而大多数青少年虽有刺激寻求增加,却未表现出犯罪行为上升趋势^[16]。总体而言,生命周期智慧模型通过整合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提供了一个更具发展性与差异性的视角。

(四) 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

尽管双系统理论强调情境(如情感背景、同伴在场)与机会因素在青少年冒险行为中的作用,其核心假设依然聚焦于神经发育失衡是青春期中期冒险行为高发的关键机制^[7]。然而,现实中的冒险行为并不总在此阶段达到高峰。在部分实验室任务中,青少年冒险水平与儿童相当。现实世界中的高风险行为,如暴饮暴食、酒驾、物质滥用、性传播疾病与意外伤害,多在成年早期而非青春期中期达峰。

为解释实验数据与现实行为的差异,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应运而生。该模型认为,冒险行为的发展受“机会暴露”驱动:随着年龄增长,外部监管(如父母监督)减弱,个体接触反社会同伴和限制性活动(如饮酒、驾驶、赌博)的机会增加,风险情境的积累促使现实冒险行为持续上升直至成年初期。尽管个体自控能力随发育增强,暴露于高度风险情境仍可能导致冒险行为增加。因此,该模型强调,冒险行为是个体倾向性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生理、心理与社会机会共同塑造的过程^[17]。尽管该模型在犯罪行为领域的直接验证尚有限,但已有大量证据表明机会结构对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研究发现父母监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发生率,为模型中的社会暴露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18]。此外,不同类型犯罪行为的高峰年龄也高度依赖机会因素:如身体攻击、破坏和盗窃等不依赖社会角色的行为多在儿童或青春期早期达峰;而诸如家庭暴力、贪污挪用等与成年身份相关

的犯罪,则多见于成年期。发展神经生态模型对此提供了独特解释,即:某些犯罪早发主要是即时冲动的表现,而复杂犯罪则受制于社会身份与资源的可得性。

综合来看,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为理解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框架,它不仅能够解释实验室任务和现实世界冒险行为之间的差异,还揭示了犯罪行为背后的心理、社会暴露和环境机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深入探讨这一模型的适用性,从而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动态发展过程,并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三、冒险行为模型的应用

尽管冒险行为模型为理解犯罪行为中的个体差异与发展差异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但要在青少年犯罪领域有效地构建和验证这些理论,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 冒险行为模型的挑战与适用性

检验上述理论有效性的一个关键途径,是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应青少年犯罪的三大核心问题:即哪些群体更容易涉足犯罪(犯罪风险的群体分布)、他们更可能从事哪些类型的犯罪(犯罪的种类与严重性),以及犯罪行为最可能在何时发生(发生的频率、情境与发展阶段)。然而在当前阶段,我们只能借助“冒险行为”这一中介视角来回答部分相关问题。正如前文所述,从青少年冒险行为理论中提炼出具体、可验证的预测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当青少年犯罪被视为冒险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时,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仍存在争议。

在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如何界定“冒险行为”仍是一个亟待澄清的核心概念。多数发展性理论通常将冒险行为界定为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的行为。然而,这一定义与实验室研究中常见的经济学视角存在差异,后者更侧重于决策过程中对结果差异较大的选择。上述差异表明,在理解和界定青少年冒险行为时,亟须关注其背后的多重动机与所处的现实情境,而不能仅依赖实验室任务中对单一行为表现的操作性定义。为更全面地理解冒险行为及其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引入犯罪学视角下关于犯罪决策的相关研究或将提供新

的理论启示。具体而言,青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会像成年罪犯一样评估潜在的成本与收益?在这一决策过程中,除了经济回报等外在因素,他们是否也受到自我相关因素(如愉悦感、羞耻感或内疚感)、社会性动机(如获得同伴认同或避免排斥)以及对外部惩罚(如被逮捕或遭受报复)的感知所影响?因此,借助犯罪学中的决策理论来重新定义和测量青少年犯罪中的“冒险行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理解其行为动因,也为探索不同情境下青少年犯罪的发生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总之,借鉴犯罪学的决策理论来定义和衡量青少年犯罪中的冒险行为,将为我们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工具,帮助我们揭示不同情境下青少年犯罪的发生机制,并为进一步的干预和预防策略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 犯罪类型的区分及其应用

在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尝试以冒险行为模型预测不同类型的犯罪仍面临诸多挑战。犯罪作为一个高度异质性的行为范畴,涵盖多种表现形式,而这些行为在不同社会与文化情境中往往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情绪高度激烈的情境中,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往往更为极端,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存在自我控制缺陷的个体,他们更容易在冲动状态下做出激烈反应。这种情绪驱动下的冲动行为特征,对犯罪类型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表面相似的行为可能源于截然不同的动机。例如,盗窃行为既可能出于获取物质利益的目的,也可能反映对刺激或认同的寻求。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醒我们,单一的行为表现不足以揭示其深层次的心理机制。因此,在理解和预测青少年犯罪时,仅依赖行为表现所建构的冒险行为模型可能存在局限。深入探究犯罪背后的动机结构,关注情境性与个体特质在动机形成中的交互作用,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识别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基础与风险机制。

尽管近年来有少数研究尝试基于双系统理论与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框架来解析青少年犯罪,冒险行为模型在性别差异方面的讨论仍然相对较少。实际上,性别差异不仅是犯罪学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也是被广泛验证的事实。无论是在重大犯罪,还是在一般犯罪中,男性的参与度都远高于女性,尤其是在重大犯罪定罪中,男性所占比例往往超过80%。男性的监禁率通常是女性的12—50倍^[19]。尽管如此,男女之间在自

我报告的犯罪行为以及登记犯罪的年龄模式上通常呈现相似的趋势,且犯罪率在15—18岁之间达到高峰。正因如此,冒险行为模型理应能够有效纳入性别差异,切实反映这一现象。冒险行为模型不仅需要假设男性和女性在寻求刺激、自我调节和风险暴露方面的差异,更应深入探讨这些差异在实际犯罪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这样的探讨将为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细致的视角,同时为未来的犯罪干预和预防策略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精准的理论支持。

(三) 冒险行为模型在司法政策中的实践

将冒险行为模型与犯罪学理论相结合并加以比较,有助于为青少年犯罪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尽管不同冒险行为模型立足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路径,其核心议题与犯罪学主流理论在多个层面高度契合,如:认知控制与刺激寻求在发展脆弱性中的作用,机会与风险暴露对行为的调节效应,个体差异对犯罪轨迹的影响,犯罪行为的潜在功能,以及同伴影响的机制等。例如,生命周期智慧模型中的“缺陷群体”是否与双重分类理论中的“终生持续型犯罪者”相对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比较有助于利用已有犯罪学数据拓展模型的解释力,提升对青少年高风险群体的识别与干预效率。此外,虽然生命周期智慧模型与双系统模型强调认知控制与刺激寻求,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则更关注自我控制的情感—认知机制,但犯罪学长期以来也关注其他社会变量,如风险暴露的社会结构性影响、心理成熟度维度(同理心、视角采择、未来导向)等。

将冒险行为模型与犯罪学理论整合,尤其在弥合“长期发展轨迹”与“短期决策行为”之间的研究鸿沟方面展现出重要价值。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自我控制理论等未能充分考虑发展性变化,而冒险行为模型可引入时间维度,推动青少年犯罪研究向多阶段、动态机制的方向演进。例如,将同伴影响研究与发展性心理病理学视角结合,有助于揭示同伴排斥、选择与反社会行为训练机制在犯罪形成中的长期作用。冒险行为模型的引入,则进一步说明同伴如何在特定发展阶段和社会情境中影响青少年的决策过程。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和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也拓展了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不同地区的法律政策(如饮酒或驾驶年龄限制)、社会规范(如父母监管与社区控制)共同构建了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生态系统,影

响其面临的风险情境。跨国比较研究发现,虽然各国青少年在实验室任务中的风险倾向曲线相似,但现实中的冒险行为表现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文化环境在行为表现中的关键作用。

(四) 基于冒险行为模型的干预与预防策略的优化

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情境变异仍难以完全厘清,这些差异可能通过双系统理论中的关键构念得到解释。例如,神经发育脆弱性(如早产、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与治疗差异、孕期物质暴露)可能影响青少年的认知控制与刺激寻求倾向。这些生物学因素与社会性变量(如法律环境、社会规范、地区犯罪率等)的交互作用,构成理解青少年犯罪的关键议题。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力框架,用于揭示行为倾向性与风险情境暴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尤其适用于解释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犯罪的塑造作用。生命周期智慧模型亦具有重要补充意义,不仅可识别高风险个体,也有助于理解不同发展阶段和犯罪轨迹。在干预实践中,冒险行为模型为青少年犯罪预防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已有干预项目关注自我控制与冲动决策等核心机制,整体成效仍有限。目前尚无干预方案将冒险行为模型系统性地整合进实践中。生命周期智慧模型强调,冒险行为是个体学习管理风险的重要机制,这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等控制性体验式学习,增强青少年对风险的认知与调节能力,从而减少不良冒险行为的发生。

总体而言,尽管冒险行为模型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但将这些理论,尤其是生命周期智慧模型与发展神经生态风险行为模型等新一代模型,应用于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未来研究应深化对这些理论的整合,拓展跨文化、跨阶段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社会机制,并基于此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谢登斌,陆金莹.青少年犯罪治理视角下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4(1).
- [2] Brame R, Turner M G, Paternoster R, et al. Cumulative prevalence of arrest from ages 8 to 23 in a national sample[J]. Pediatrics, 2012(1).

[3] 于阳,周丽宁.中美城市青少年有组织犯罪的时空分布与防范对策研究[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3(4).

[4] Shulman E P, Monahan K C, Steinberg L. Severe violence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and its relation to anticipated rewards and costs[J]. Child Development, 2017(1).

[5] 何芳.欧美青少年文化的发展历程——评《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J].当代青年研究,2011(8).

[6] 郭龙龙.补偿心理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原因分析[J].犯罪与改造研究,2024(6).

[7] Steinberg L, Albert D, Cauffman E, et al. Age differences in sensation seeking and impulsivity as indexed by behavior and self-report: Evidence for a dual systems model[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8(6).

[8] Defoe I N, Van Gelder Ribeaud D, Eisner M. The Co-development of friends' delinquency with adolescents' delinquency and short-term mindse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offending[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1(5).

[9] Albert D, Chein J, Steinberg L. The teenage brain: Peer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decision making[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2).

[10] Reyna V F, Wilhelms E A, McCormick M J, et al. Development of risky decision making: Fuzzy-trace theory and neurobiological perspectives[J].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2015(2).

[11] Reyna V F, Helm R K, Weldon R B, et al. Brain activation covaries with reported criminal behaviors when making risky choices: A fuzzy-trace theory approach[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8(7).

[12] Romer D, Reyna V F, Satterthwaite T D. Beyond stereotypes of adolescent risk taking: Placing the adolescent brain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J].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17(2).

[13] Allard T, Stewart A, Smith C, et al. The monetary cost of offender trajectories: Findings from Queensland (Australia)[J].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4(1).

[14] Moffitt T E.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3(4).

[15] Fairchild G, Smaragdi A. The Wiley Blackwell handbook of forensic neuroscience[M]. New York: Wiley, 2018.

[16] Murray A L, Zhu X, Mirman J H, et al. An evaluation of dual systems theories of adolescent delinquency in a normative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of youth[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21(7).

[17] Sampson R J, Laub J H. Integrated Developmental

and Life-Course Theories of Offending[M].New York:Routledge,2017.

[18] Racz S J, McMahon R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knowledge and monitoring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conduct problems: A 10-year update[J].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2011(4).

[19] Boppre B, Miethe T D, Troshynski E I, et al.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men's imprisonment rates: Exploring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other macro-level fac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2021(2).

How to Explain Juvenile Delinquency: Evolution, Types, and Application of Risk-taking Models

GAO Junjie, XIN Sufei

School of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Correction Institute of Problematic Juvenil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in adolescent crime rates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result of adolescent propensity for risk-taking behaviors. Current prominent models of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s include Dual Systems Theory, Fuzzy Trace Theory, Lifespan Wisdom Model (LWM), and Developmental Neuro-Ecological Risk-taking Model (DNERM). Dual Systems Theory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al imbalance between sensation-seeking and self-regul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Life-Span Wisdom Model reveals the vulnerability of certain groups whose risk-taking is driven by poor cognitive control; Developmental Neuro-Ecological Risk-taking Model further undersc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predisposition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norms, legal environmen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ffecting the risk-taking behaviors; although Fuzzy Trace Theory remains incomplete in accounting for the variability in risk-taking behaviors, it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ow adolescents gradually develop social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risk percep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heories with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s to explore the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underly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rven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 delinquency; crime; risk-taking model

(责任编辑 沐 瑾)